



品出叶挺诗歌中的赤胆忠心

临危不惧显本色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的一户农家，自幼家境贫寒。20世纪初，为了摆脱任人宰割欺凌的悲惨命运，革命党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这给叶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少时的叶挺反复诵读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邹容、章炳麟等人的革命作品，深受爱国和民主思想的熏陶。老师陈敬如鼓励他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奋发进取，并为他另起一名——叶挺，蕴含“人要上行，叶要上挺”与“挺身而出，拯救中华”之意。人如其名，叶挺将老师的教诲和期望时刻铭记在心，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无论身处顺境或遭受挫折，从未改变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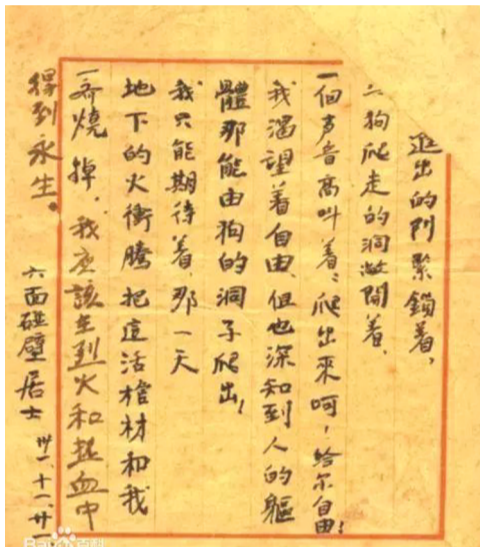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奉命北移，当行军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早有预谋的围袭。军长叶挺指挥将士与数倍于己之敌浴血奋战，在极为危急的情势下，为了鼓舞部队的作战士气，他口述了两句诗歌，又嘱部下补上后两句，成七绝一首：“雾里旌旗云里山，凭崖勒马君试看。层峰直上三千丈，出峡蛟龙瞬息还。”诗歌的第一句描述了新四军的作战环境，山势险要，云山雾罩，顽敌人头攒动。第二句指出虽面临强敌，我们仍要镇静自若、泰然处之。第三句用高耸的山峰暗指顽敌的重围。第四句是诗歌的主旨句，指出新四军就像蛟龙出峡那样，一定能够突出重围，保存革命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把顽敌消灭。此诗是向敌进攻所发出的嘹亮冲锋号，反映了叶挺临大敌而不乱，不畏艰险，勇于胜利的高贵品质，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贞不二。

身陷囹圄志更坚

皖南事变中，叶挺为了减少新四军的伤亡，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敌军谈判交涉，却遭到国民党顽军的无理扣押。叶挺被押送到了宁国上官云相的总部，后囚禁于江西上饶。入狱伊始，叶挺断断续续地写下了《囚语》一文，回顾了坎坷的往事，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文章开篇写道：“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作，赤条条来光棍逝。”这首诗表明叶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求问心无愧，绝不做背叛革命事业的下作之事。国民党高官用不同的方式劝降，皆被叶挺严词拒绝。新四军叛徒赵凌波前来监狱游说，被叶挺轰了出去。为了回击这些丑恶的嘴脸，叶挺以诗表明自己的心迹，写下了狱中题壁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

颜廷平

叶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在战功赫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叶挺用生命彰显了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气节，在生死攸关的残酷考验面前仍坚贞不屈，这在他诗歌的字里行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囚歌》原文版

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诗歌明确指出国民党的百般威逼利诱对真正的革命者而言毫无用处，他们的各种拙劣表演只是让人大开眼界，增加一些笑料罢了，体现了叶挺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

此后，叶挺被辗转囚禁于桂林、重庆、恩施等地，颠沛流离的软禁生活没有削弱他坚强的意志；国民党高官陈诚等屡次劝说，丝毫没有动摇他坚定的信念；当蒋介石亲自与其见面，让他变节投降时，叶挺以“请枪毙我”相拒。

备受煎熬的牢狱生活，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随时可能被砍头的威胁，都不能使叶挺屈服。叶挺英勇无畏、大义凛然，或被囚禁于阴暗的囚室，或在监视中牧羊于田间，炽热而浓厚的家国情怀唯有通过诗歌表达给世人所知。1942年11月，叶挺在重庆的囚室里写下了著名的诗作《囚歌》，手抄本通过夫人李秀文探监带出转交

给了郭沫若。诗歌写道：“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叶挺在这首新体诗中，将“人”与“狗”、“门”与“洞”做了鲜明的对比，指出革命气节远远高于生命和自由，宁可将牢底坐穿也绝不苟延残喘地活着，为了换得多数人的自由不惜舍弃小我之自由。郭沫若在散文《叶挺将军的诗》中写道：“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诗歌没有引经据典，读起来通俗易懂却又震撼心扉，给人以刚毅不屈与志高行洁之感，凸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和浩然正气。

就在叶挺出狱之前，任职于国民党军统的沈醉好奇地专门去监狱看他。因为这个监狱曾经关押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他们出狱后的第一件事或是见家人，或是大吃一顿，或是拍照。沈醉很想知道共产党的将领出狱后第一件想干的事是什么。叶挺郑重地说，如果能出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请求党组织恢复我的党籍。如此铿锵有力的回答让沈醉惊诧不已，没料到一个长期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竟是如此忠贞不渝。

遗风化育后来人

1946年3月4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大力营救，叶挺脱离牢笼获得了自由。第二天他就致电毛泽东并转党中央：“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这份入党申请书，是叶挺5年多牢狱生活所作出的毅然抉择，也是他一心向党、全心为国为民的最好见证。7日，党中央复电称赞他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决定接受他入党。

1946年4月8日，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叶挺及同机人员不幸全部罹难，他的宝贵生命定格在了重见光明之后的50岁。噩耗传来，全党和各界有识之士无不悲痛欲绝，纷纷举行悼念活动，以寄托人们无限的哀思。

陈毅在悼念叶挺的长诗中写道：“我只希望你的遗风长存，化育无数后继之英才。”恰如所言，叶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高尚品格，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叶挺的名字与诗歌早已化作催人奋进的力量源泉，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田播下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的种子。

据《学习时报》

陈梦家劝钱穆写通史

1938年4月，钱穆在一间大教室里给西南联大学生教授《中国通史》。他怀着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通过讲授历史勉励学生爱国。由于西南联大允许旁听，因此来听钱穆讲课的人员多到教室里都站不下，很多人要站到外面才行。此等盛况其实早在钱穆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时就常常出现。

曾为师生，后来成为同事的陈梦家和钱穆交往甚密。两人傍晚经常一起散步讨论学术与时局。当时，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土地沦陷，国内投降主义甚嚣尘上，亡国似乎就在眼前。谈及中国未来，钱穆认为广大青年必须要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和为国奋斗的意愿，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陈梦家力劝钱穆把《中国通史》讲义写成一本通史教科书，让西南联大之外的全国广大青年也受益。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钱穆仍痛下决心，抱着“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谢绝众多演讲的邀请，住进了幽静的岩泉寺潜心写作。原本计划两年完成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就完成了。

1940年6月《国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在扉页写道：将此书奉献给战场上牺牲的百万将士。书一面世，就成为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有史学家评论《国史大纲》：“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所以自存矣。”

万庆东 据《人民政协报》

李大钊乐善好施

1916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一职，两年后被评为教授，月工资200元，加上他在其他学校的兼职，每月收入300余元，这在当时收入并不低。但他生活俭朴，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支持党的工作，或用来帮助同志，救济贫苦青年等。他同时代的人这样描述他：“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这就是李大钊当时真实生活的描述。

共产党小组成立时，因缺少经费，李大钊每月从工资中拿出80元，用于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时，也是李大钊资助并筹措解决经费困难。许多人知道李大钊乐善好施，每逢遇到困难时便去找他。李大钊来者不拒，如果手头没钱，他就写个借条让对方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时再让会计把上月借的钱扣除。他总是替别人着想，就如爱因斯坦所说：

“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将心比心，慈悲为怀。许多人心疼他的做法，担心长期下去，他们家的生活会受到影响。

令人叹息的是，每月发薪水时，李大钊领到的往往是一大堆借条，拿不到几个现钱。可见李大钊因为经常帮助别人，全家人的生活确实受到了极大影响。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在绞刑架上，年仅38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大钊牺牲后，中外记者纷纷来到他租住的家中采访，看到的却是李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景象。记者们惊讶不已，唏嘘不已：李大钊作为北大的知名教授，家中为何如此寒酸？

李大钊的乐善好施足以让他的品德彪炳千古，让人尊崇，令人敬仰！

张雨 据《人民政协报》